



John Dewey

杜威教育文集

DUWEI JIAOYU WENJI

吕 达 刘立德 邹海燕 主编

第 3 卷

If we are willing to conceive education a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fundamental disposition,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, toward nature and fellow-men, philosophy may even be defined a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ducation.

Unless a philosophy is to remain symbolic-or verbal-or a sentimental indulgence for a few, or else mere arbitrary dogma, its auditing of past experience and its program of values must take effect in conduct.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吕 达 刘立德 邹海燕 主编

杜威教育文集

第 3 卷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杜威教育文集

杜威教育文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威教育文集. 第3卷/吕达, 刘立德, 邹海燕主编.

—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05

ISBN 978-7-107-18525-0

I. 杜...

II. ①吕... ②刘... ③邹...

III. 杜威 (1859—1952) —教育思想—文集

IV. G40-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7915 号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: 25.25 插页: 2

字数: 302千字 印数: 0 001~1 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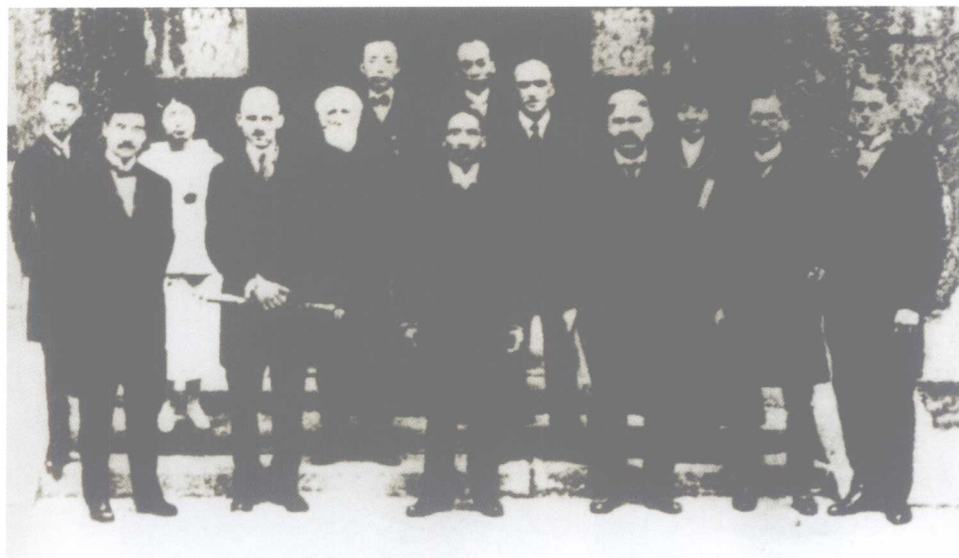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107-18525-0 定价: 37.60元
G·11614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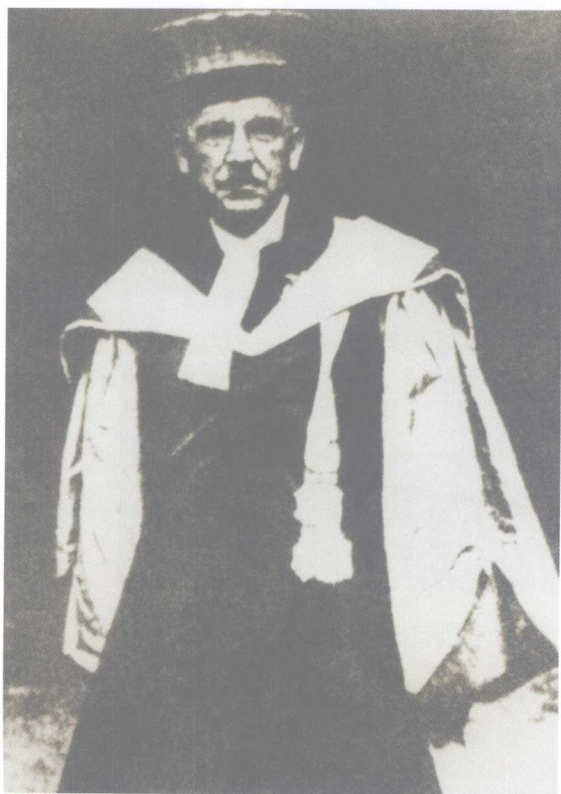
(联系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 10008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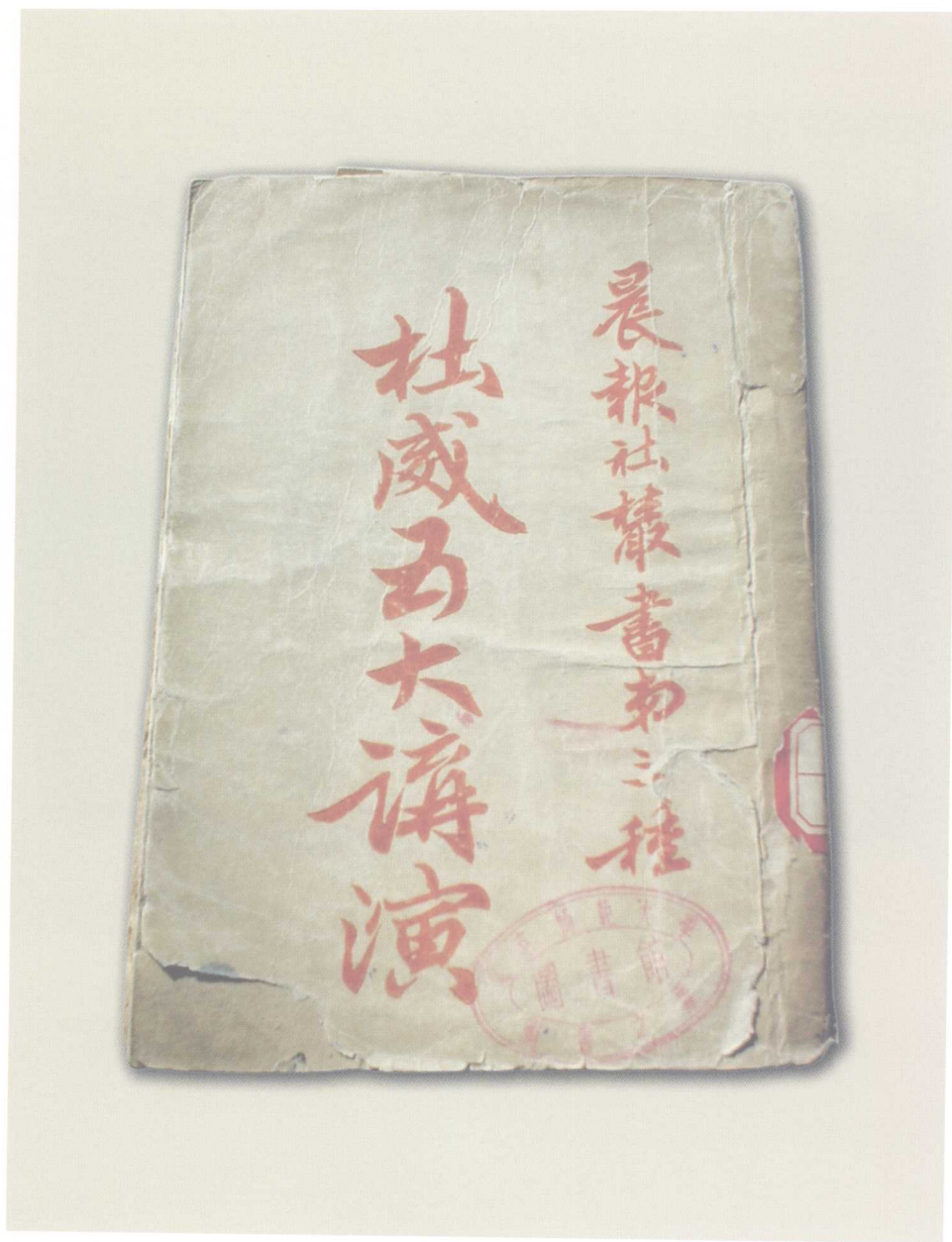
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的杜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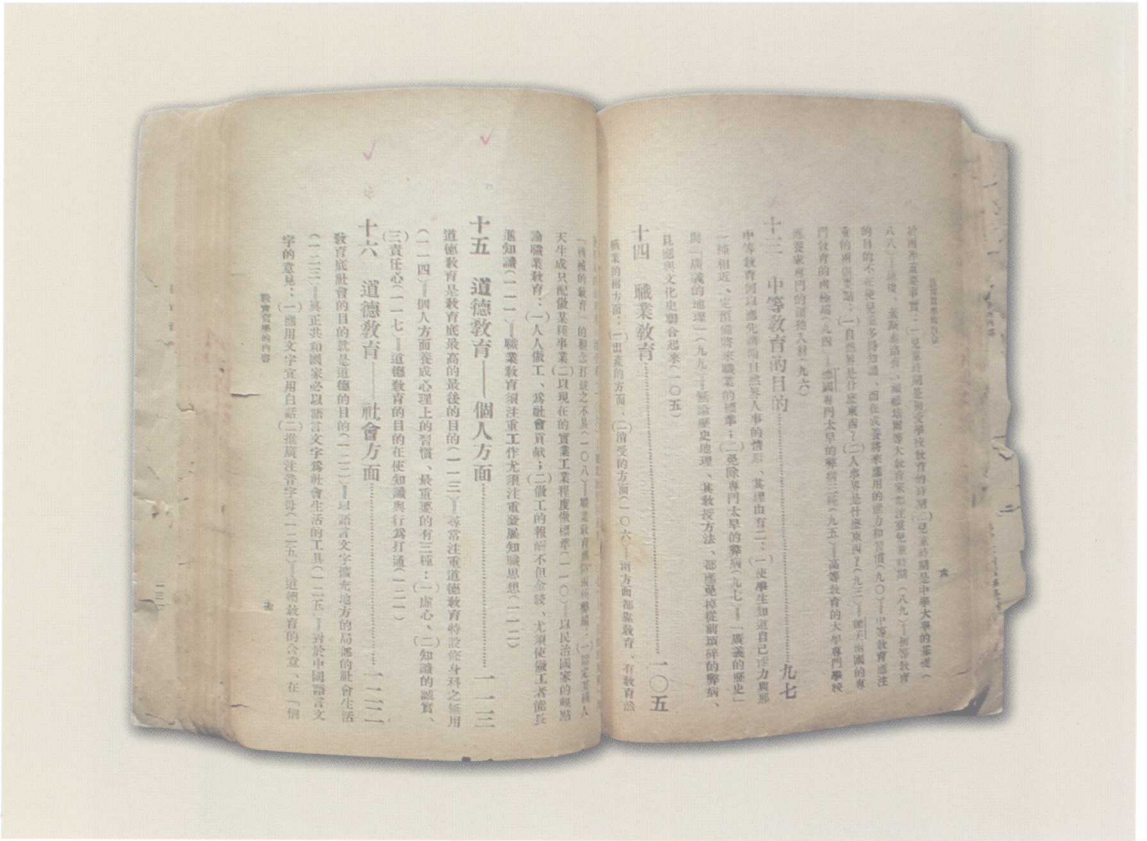
1920年杜威（前排右三）等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后与蔡元培（前排右四）等合影



1930年法国巴黎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



1920年8月晨报社出版的《杜威五大讲演》封面



1920年8月晨报社出版的《杜威五大讲演》内文

《杜威教育文集》编辑委员会

学术顾问	瞿葆奎	王承绪	顾明远	任钟印
主任委员	韩绍祥	李志军	魏国栋	
副主任委员	吕 达	魏运华		
委 员	(按姓氏拼音排序)			
	郭法奇	韩绍祥	李申申	李志军
	刘立德	刘新科	吕 达	曲铁华
	王 莉	魏国栋	魏运华	徐小洲
	杨汉麟	杨孔炽	周 采	邹海燕

本卷译者 胡 适

编者说明

一、杜威 (John Dewey, 1859—1952) 是世界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、哲学家, 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并正继续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, 特别是教育科研工作者、师范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学习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需要, 我们在 2002 年杜威逝世 50 周年之际, 开始选编《杜威教育文集》; 至 2004 年底杜威诞辰 145 周年之际竣稿, 后又曾多方征求意见。

二、《杜威教育文集》收录了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, 也酌收了少量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论著, 共计五卷。选文以年代为顺序, 具体内容和译者如下。

第一卷, 选编了杜威 1897 年至 1915 年撰写的《我的教育信条》、《学校与社会》、《儿童与课程》等 6 种教育名著。主要译者为赵祥麟、任钟印、吴志宏、顾岳中。

第二卷, 选编了杜威 1916 年撰写的著名的教育专著《民主主义与教育——教育哲学导论》。译者为王承绪。

第三卷和第四卷, 选编了杜威 1919 年 4 月底至 1921 年 8 月在华的主要教育讲演: 第三卷是著名的《杜威五大讲演》, 也就是在北京的系统讲演; 第四卷包括著名的《杜威三大讲演》, 也就是在南京的系统讲演, 以及在其他各地的讲演。主要译者为胡适等。

第五卷, 选编了杜威 1920 年至 1952 年撰写的 15 种著名的教育论著。主要译者为王承绪、赵祥麟、姜文闵、金冬日、赵端瑛、顾岳中等。

三、每卷书前均选编了相关的图片资料, 以及译者或有关专家撰写的“本卷前言”(第三、四卷背景相同, 合用一个前言),





希望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有所裨益。

四、为了使读者对杜威其人的全貌、活动的轨迹及思想的脉络有一个完整的了解，我们在每卷书末加了一份相当权威的附录《杜威生平和著作年表》；第三卷书末还附录了《杜威与中国》和《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》。

五、本书选编的杜威教育论著，是由众多专家学者进行翻译的。我们在相应的位置注明了译者姓名。在此谨再次向他们致敬鸣谢。

六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，浙江大学教授王承绪，中国教育学会顾问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葆奎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任钟印等专家学者对本书编选给予了大力指导；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关同志，北京大学蒋凯同志，北京师范大学董乃强同志等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。谨此一并致谢。

七、由于论著的翻译出自众人之手，尤其是杜威在华讲演，随讲随译随记，体例和译法难免有不尽一致的地方。有些人名、地名和术语的译名，用的是当时的习惯用法。此次我们选编时，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性校订；但是凡不致影响阅读的文字均维持原貌，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学术风格和流变。杜威在华各次讲演的时间和地点，有的记载十分明确，有的记载则不甚明确；尤其是对杜威教育论著和讲演中所蕴涵的思想的确切体认和理解，实赖有关专家学者和师生专门的研习和解读。

八、囿于编者水平，本书不当甚至错漏之处，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为盼。

编者

2007年12月于北京

本卷前言*

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，以近代而言，西方其他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，如洛克、卢梭、裴斯泰洛齐、福禄培尔、斯宾塞、尼采的教育思想，以及拿托普（P. Natorp）的社会教育学等。特别是由蒋维乔译的日本吉田熊次著的《新教育学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09），是与“以往之教育学”即“18世纪之个人主义为立脚地的教育学相区别”，介绍了西方社会教育学说的教育学。它意味着教育学不仅要着眼个人的发展，同时要关注社会的进步，开展了教育学的新生面。当然，在影响上这些都不能与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匹敌。不过，他们多少“阻遏”了赫尔巴特学派独占中国的教育学天下。我国当时的教育学画面还是有其色彩的。

1892年，私淑与受教于莱因的美国学生德加谟（C. DeGarmo）、麦克默里兄弟（C. A. McMurry & F. M. McMurry）等发起，在美国组建“赫尔巴特学社”（Herbart Club）。

* 本文原是瞿葆奎先生撰写的《中国教育学百年》的一部分。《中国教育学百年》一文收入瞿葆奎先生的自选集《教育学的探究》，2004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作者2004年12月在该文的题解和脚注中说，该文“应当年《教育研究》连瑞庆主编之约于1998年初开始撰写。曾以上、中、下篇分别刊于《教育研究》1998年第12期，1999年第1、2期。自发表迄今已逾六年了。再读稿，错漏不少；且近年来一些著作、论文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中国教育学的百年，既应勘误、补充，又应学习、引用，于是再反复改稿。然而讹误、阙失尚多，至恳正讹、匡阙。”又说，“本文先后十易，乃成初稿发表。熊川武同志参加了头稿的撰写。”此次作为“本卷前言”，瞿先生又对本文进行了修改、补充。



1895年，又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“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），简称“全国赫尔巴特学会”（National Herbart Society）。杜威当年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。他的论文，如：

《兴趣与意志训练的关系》（*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raining of the Will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年报》（1895）。

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》（*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-Epoch Theory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第二年年报》（1896）。

《教育基础的伦理学原理》（*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第三年年报》（1897）。^①

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“杜威才成为了杜威”。也许可以认为，杜威的《我的教育学信条》（*My Pedagogic Creed*）（1897）是其重要标志。

1901年^②，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又改名为“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），在这里，它脱掉了“赫尔巴特”的“帽子”。1910年再改为“全国教育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, NSSE）^③。20世纪初，原

① 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·杜威教授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第34、36页；简·杜威著，单中惠编译：《杜威传》（附录二）杜威著作目录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88~89页；杜祖贻著，陈汉生、洪光磊译：《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》附录杜威早期著作目录（1882~1898）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11~112页。

② 下页注①的三书均为1902年，误 [See S. Jaszczak (Ed.), *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*, 31st ed., 1996, p. 1014. 这是西密歇根大学沈剑平教授给我邮来的材料]。

③ F. Eby & F. Arrowood, *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*, 1934, 19th printing, 1946, p. 787. W. F. Connell, *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*, 1980, p. 61. 滕大春：《美国教育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14~615页。



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，像德加谟、麦克默里兄弟等，逐步地疏离赫尔巴特学派，逐步地坚定地走进杜威学派了。^①

就国际范围的潮流来说，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，它的全盛时期，也许是在 1880 年左右到 1910 年左右；20 世纪开始未久，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。在国际范围说，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。孟宪承教授当年曾对我说：“两个学派，一个世纪！”它们有它们各自出现的年代。真是“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”^②。

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、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。至 1915 年左右，无论是“翻译”还是“自己编著”，都进入了低谷。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了。

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 20 世纪初期，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。例如 1912 年，蔡元培在《对于教育之意见》中，以及 1915 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《1900 年以来教育之进步》、1918 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讲演《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》，都点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。1919 年杜威来华前夕，他在北京青年会的讲演《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》说：“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，不久要来中国。他创了一种很新的教育主义，即工即学，是要学校

^① W. F. Connell, *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*, 1980, p. 69. 康内尔著，张法琨、方能达、李乐天等译：《20 世纪世界教育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139~140 页；康内尔著，孟湘砥、胡若愚主译，周定之、张文庭校：《20 世纪教育史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120 页。

^② 马克思：《哲学的贫困》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146 页。



生活与社会生活密接。”^①

我国一些期刊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有过介绍。例如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教育杂志》于1917年4月就刊出过天民（朱元善）的《台威氏之教育哲学》（第9卷第4号）（按：台威即杜威），系摘译杜威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（*Democracy and Education*）（1916）的第24章《教育哲学》（*Pilosophy of Education*）；同年9月，天民的《台威氏明日之学校》（第9卷第9号），系介绍杜威与他长女伊夫琳·杜威（Elelyn Dewey）合著的《明日之学校》（*Schools of Tomorrow*）。1918年1月、3月和4月，又刊出了天民的《今后之学校》（第10卷第1、3、4号）的连载，系摘译《明日之学校》；等等。

1919年，应北京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江苏省教育会、浙江省教育会等单位的邀请，杜威访华。^②当年他60岁。

他来华前，3月上旬，胡适以《实验主义》为题目，在当时北平的教育部讲演四次，内容包括七个部分：一、引论；二、皮尔士——实验主义的发起人；三、詹姆士的心理学；四、詹姆士论实验主义；五、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；六、杜威论思想；七、杜威的教育哲学。^③这确是一篇了解杜威实验主

^① 蔡元培：《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——在北京青年会演说词》（1919年3月15日），载高平叔编：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83页。

^② 王剑：《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》，对邀请单位有辨正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3年第1期。

^③ 其第一至第四部分，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4号（1919年4月）；其第五和第七部分，发表于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“杜威号”（1919年4月）；其第六部分，发表于《新中国》第1卷第2号（1919年6月）。《实验主义》的全文，集于《胡适文存》第1集第2卷，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，第409~479页。胡适在文末署：“民国八年春间讲演，七月一日改定稿。”



义不可不细读的入门之作。

3月31日，陶知行（行知）在《时报·教育周刊·世界教育新思潮》上，发表了《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》。4月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教育杂志》（第11卷第4号）刊出了杜威的肖像插图；4月的《新教育》（第1卷第3期）^①为专号“杜威号”，登载了《杜威先生传略》、杜威肖像、杜威夫妇参观《申报》馆时与史量才、张竹平暨胡适、蒋梦麟、陶知行的合影，以及胡适的《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》和《杜威的教育哲学》；蒋梦麟的《杜威之伦理学》和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^②；刘经庶（伯明）的《杜威之伦理学》；朱进的《教育与社会》，为杜威来华的讲演开道。这一期的《新教育》还刊出了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一个半小时的《实验主义》普及性讲演，说是替杜威“先开辟出一道儿，再加些洒扫功夫”。他在给蔡元培校长的信中也说：“昨（按：5月2日）晚上我在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，以为他明日（按：5月3日）讲演的导言。”^③还刊出了杜威来华后的首场讲演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——5月3~4日在江苏省教育会的讲演，由蒋梦麟翻译。

随着杜威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四天，即4月30日下午抵

^① 显然，这一期的《新教育》是延期发行的，因这它包含了5月的史实。

^② 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，载蒋梦麟的《杜威之伦理学》和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为前后两篇。前篇署名，后篇未署名。或谓蒋文前篇为《杜威之人生哲学》，与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题目在形式上未符，文字也有所改动。或谓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为胡适的论文，误。1919年7月6~9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转载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，署名胡适，误。

^③ 1919年5月8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。

达上海,^①到1921年7月11日离京,8月2日离青岛经日本

① 《申报》(1919年5月1日,第十版):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……兹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,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,不及来沪)……”《民国日报》(1919年5月1日,第十版):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……兹已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,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君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君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君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君,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,不及来沪)……”《时事新报》(1919年5月1日,第四版):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。兹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,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君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知行君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君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君,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,不及来沪)……”北京《晨报》(1919年5月2日第三版):“美国哲学家抵沪”,“杜氏已于前月(按:指4月)27日由日本神户乘船来华,于30日抵上海。”上海英文周刊《密勒氏评论报》(1919年5月3日),也报道杜威夫妇已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。

黎洁华:《杜威在华活动年表》(上),载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》1985年第1期;简·杜威著,单中惠编译:《杜威传》(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,第2、50页编者注②、第76页);赵祥麟编译:《杜威生平 and 著作年表》(载杜威著,王承绪译: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,第397页)等,是确切的。不少论著说杜威5月1日到达上海,不确。杜威在北京讲《教育哲学》中,曾误记:“我到中国是5月1日”(载《杜威五大讲演》,第255页)。就连4月30日下午为首去码头迎接杜威的胡适,也误记为杜威是1919年5月1日到上海的。如胡适:《杜威先生与中国》(载1921年7月11日《晨报》,又载1921年7月13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,再载《东方杂志》第18卷第13号,1921年7月),以及胡适:《杜威在中国》(载葛懋春、李兴芝编辑:《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》(上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555页;又载《哲学译丛》1964年第3期)。但他在当年5月3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:“杜威博士夫妇于30日午到上海,蒋(梦麟)、陶(知行)和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……”(载1919年5月8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)。

本来,4月30日与5月1日,早一天晚一天,无关宏旨。只是还历史的本真耳。



回国^①，他在中国曾作了两百多次讲演——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。

他来华前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她的众多讲演的译文全文、摘要或报道；他旅华期间和离华以后，一些研究者发表了不少论文（见本书附录二，这个附录也是不完全的计数）。

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，主要是在我国 20 世纪 20~40 年代陆续翻译出版的（以原著出版先后为序）。例如：

《我的教育学信条》（*My Pedagogic Creed*）（1897），郑宗海译：《杜威氏之教育主义》，载《新教育》第 1 卷第 2 期，1919 年 3 月。^②

《学校与社会》（*The School and Society*）（1899），刘衡如译，中华书局，1935。

《儿童与课程》（*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*）（1902），郑宗海译：《儿童与教材》，中华书局，1922。

《德育原理》（*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*）（1909），元尚仁译，中华书局，1921；张铭鼎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30。

《我们怎样思维》（*How We Think*）（1910），刘伯明译：《思维术》，中华书局，1929；1933 年第 2 版；孟宪承、俞庆棠译：《思维与教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。

《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》（*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*）（1913），张裕卿、杨伟文译：《教育上的兴味和努力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3。

《明日之学校》（*Schools of Tomorrow*）（与伊芙琳·杜威合著，1915），朱经农、潘梓年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23。

^① 过去往往讲杜威于 1921 年 7 月 11 日“离京回国”，其实杜威“离京”后并未马上回国，而是再莅山东，在山东游历和讲演了二十多天，是在 8 月 2 日才离青岛经日本回国的。（王剑：《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》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3 年第 1 期。）

^② 据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》，第 36 页：“前有郑宗海译本；后有曾昭森，1959 年香港出版。”